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21

公共压力与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①

何红渠,唐丽梅,时林娜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选用全国性公益基金会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公共压力与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受益者压力能够显著提高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除此以外,不同属性的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对公募基金会而言,捐赠者压力小、政府资助压力小、志愿者压力大、教育类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对非公募基金会而言,媒体压力大、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

关键词: 公共压力;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公益基金会;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1-0112-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Pressure and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f Charity Foundations

HE Hong-qu, TANG Li-mei & SHI Lin-na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2011-2013 national charity foundation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pressure and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FIDQ) of charity foundations. It shows that the determinants of FIDQ on Public Raising Foundations (PRF) and Non-public Raising Foundations (NPRF) are different except for the beneficiary pressure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FIDQ of both PRF and NPRF. For PRF, low donor pressure and government funding pressure, great volunteer pressure, and educational PRF's FIDQ is high. For NPRF, powerful media pressure, and those in the charge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have higher FIDQ than that of others.

Key words: public pressure;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charity foundation; determinants

引言

公益基金会在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方面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公益腐败”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屡屡曝光,严重损坏了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导致了公益资金募集数额的下降。因此,开展公益组织信息披露研究,提高公益组织信息披露透明度,提升公益组织公信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针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研究相对较少。Shim and Siegel(1997)提出实现组织的稳定和发展是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目标,且充分有效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1]34-36}。Behn(2007)研究发现高管人员薪资水平高、规模大、资产负债率高、募集资金多的教育类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披露程度高^[2]。我国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陆建桥(2004)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其财务管理的目标应当是满足捐赠者、服务对象、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3]。目前仅有刘亚莉(2013)经过实证检验发现组织越复杂、

① 收稿日期:2014-04-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209)

作者简介:何红渠(1964-),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研究。

管理效率越高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且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对捐赠者决策有显著影响^[4]。

检索发现,国内外还鲜见探究公共压力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文献。在非营利组织中,公益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相对较高,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本文利用全国性公益基金会2011-2013年的数据作研究样本,运用合法性理论从公益基金会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研究公共压力对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从研究内容及方法上丰富了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最早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韦伯认为利益特权必须被证明其合法性才能被社会所接受^[5,45-51]。Brown and Deegan提出社会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隐性的社会契约关系^[6]。当利益特权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被证伪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就会遭受威胁。因此,为了证明其合法性,缓解隐性社会契约引起的公共压力,组织会倾向于披露更多的有利信息^[7]。Walden and Schwartz指出利益相关者对组织行为的不满是导致公共压力的主要原因^[8]。一般认为,公益基金会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捐赠者、政府、志愿者、受益者、媒体等。因此,本文将以基金会不同利益相关者所引起的公共压力为视角,分析公共压力对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1.1 研究假设

1.1.1 捐赠者压力

假设每单位无偿取得的收入所产生的压力相同,则捐赠收入作为公益基金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则说明公益基金会对捐赠者的依赖程度越高,从而来自捐赠者的压力也就越大。为缓解这种压力,确保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基金会有动力披露更多的财务信息,增加财务信息透明度,提升整体公信力。因此,提出假设 H₁: 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来自捐赠者的压力越大,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1.1.2 政府压力

由于对公益基金会而言,政府既是资助者,也是监管者。因此,本文将从政府所承担的两个不同角色着手,分别分析政府资助压力和政府监管压力与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首先,政府作为公益基金会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公益基金会有动力通过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来获取政府信任,从而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资金。因此,本文以政府补助收入占公益基金会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资助压力,并提出假设 H_{2a}: 公益基金会政府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来自政府的资助压力越大,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其次,政府作为监管者,同时也是政策制定者,必然会对公益基金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公益基金会负责人中有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或曾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前政府官员,我们则可以认为基金会具有政治关联。Fan(2007)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能够很好地反映政府干预力度^[9]。因此,本研究认为公益基金会高管具有政治关联,则意味着政府对其的干预力度大,即公益基金会所承受的政府监管压力大,则基金会具有通过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来缓解政府监管压力的动机,因而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就越高。据此,提出假设 H_{2b}: 公益基金会高管具有政治关联,则来自政府的监管压力大,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

1.1.3 志愿者压力

与企业不同,公益基金会的专职工作人员较少,而公益项目的顺利开展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因此,志愿者便成为维持公益基金会高效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力量,公益基金会有通过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获取志愿者信任的动机。因此,志愿者也能对公益基金会施加压力。据此,提出假设 H₃: 公益基金会有志愿者提供无偿劳动,则来自志愿者的压力大,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

1.1.4 受益者压力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更多,且积极的期望会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同理,曾经获得过公益基金会资助的受益者,会期望在以后的年度内继续获得相应的资助,而这种来自受益者的期望会转化成压力对公益基金会产生影响。当公益基金会无法满足这种期望时,为缓解压力,公益基金会就会选择通过详细的财务信息披露来为其欠佳的年度业绩表现做出辩解。据此,提出假设 H₄: 公益基金会上一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越高,来自受益者的压力越大,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1.1.5 媒体压力

Brammer and Pavelin(2004)等西方学者曾多次证实媒体新闻报道数量与企业信息披露有着显著关联^[10]。传统方法通常选用重要报刊、杂志等对组织的报道量作为媒体压力的衡量指标。但在互联网时代,多数媒体会将所刊登的新闻内容发布到互联网上,供大众搜索和浏览。互联网所涵盖的信息数量远远超过了传统纸质媒介。所以,本文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新闻高级搜索,以公益基金会名称为关键词,将新闻搜索的时间区间分别设定在2011、2012、2013三个年度,以所查询到的公益基金会新闻条数作为媒体压力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假设H₃:公益基金会媒体报道数量越多,来自媒体的压力越大,则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就越高。

1.2 模型构建

根据Callen and Falk(1993)、Tinkelman(1996)等人的研究成果,非营利组织的规模、行业、成立时间均会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在分析中控制了以上变量^[11-12]。此外,考虑到我国公益基金会“双重管理”体制的特殊性,我们还控制了业务主管单位、基金会属性两个变量。据此,本文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text{Total Quality} = \beta_0 + \beta_1 \text{Donator} + \beta_2 \text{Government Funding} + \beta_3 \text{Government Control} + \beta_4 \text{Volunteer} + \beta_5 \text{Beneficiary} + \beta_6 \text{Media} + \beta_7 \text{Asset} + \beta_8 \text{Age} + \beta_9 \text{Administration} + \beta_{10} \text{Industry} + \beta_{11} \text{Public}$$

其中 β_0 为截距, $\beta_1 - \beta_{11}$ 为系数,以上模型所用的变量解释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变量定义一览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Total Quality	取值范围[0,100]
完整性信息披露质量	Integrity Quality	取值范围[0,30]
可靠性信息披露质量	Reliability Quality	取值范围[0,30]
及时性信息披露质量	Timeliness Quality	取值范围[0,20]
易得性信息披露质量	Availability Quality	取值范围[0,20]
捐赠者压力	Donator	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政府资助压力	Government Funding	政府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政府监管压力	Government Control	有政治关联取1,无政治关联取0
志愿者压力	Volunteer	有志愿者取1,无志愿者取0
受益者压力	Beneficiary	上一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的自然对数
媒体压力	Media	百度搜索引擎新闻条数的自然对数
基金会规模	Asset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成立年限	Age	基金会成立至样本年度的年限
业务主管单位	Administration	民政部取1,其他取0
行业	Industry	教育类取1,其他类取0
基金会属性	Public	公募基金会取1,非公募基金会取0

2 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

本文在参考陈岳堂所编制的非营利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13]、刘亚莉设计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14]、中国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估体系的基础之上,从完整性、可靠性、及时性、易得性四个维度设计了“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表2),并以此对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分。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取值范围在[0,100]之内。

3 样本选择和实证结果

3.1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1~2013年,由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网统计并发布的公益基金会信息为初选样本。鉴于地方性公益基金会通常规模较小,年度工作报告书披露尚不完善,且财务报告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财务信息披露渠道^[15],本文仅选取财务信息披露相对健全的全国性公益基金会作为分析样本。在剔除样本数据缺失,及1%和99%分位数之外的异常值后,共得到288个公益基金会年

度观测值,其中公募基金会样本为 174 个,非公募基金会样本为 114 个。本文所需原始数据均通过手工收集完成,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基金会子站、基金会官方网站与官方微博,以及百度新闻搜索引擎。

表 2 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①

维度	信息类别	评价指标
完整性(权重 30%)	基本财务信息(7)	年度报告(或摘要)
		资产负债表
		业务活动表
		现金流量表
		会计报表附注
		审计报告
		监事会意见书
	筹资财务信息(4)	捐款免税说明
		年度筹资总额
		筹资来源明细
项目财务信息(3)	年度项目支出额	
	项目基本信息	
管理财务信息(2)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管理费用	
可靠性(权重 30%)	筹资财务信息(2)	高管薪酬
		筹资额预算可靠性
	项目财务信息(3)	筹资费用预算可靠性
		公益事业支出预算可靠性
		项目执行率
	管理财务信息(1)	项目第三方评估
		管理费用预算可靠性
	其它财务信息(3)	民政部年度评估等级
行政处罚		
审计意见类型		
及时性(权重 20%)	基本财务信息(1)	年度报告(或摘要)披露及时性
	筹资财务信息(2)	筹款期间信息披露及时性
		筹款成果信息披露及时性
	项目财务信息(2)	项目期间信息披露及时性
项目成果信息披露及时性		
易得性(权重 20%)		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
		刊物
		联系方式(电话、邮箱、地址等)
		是否可在其他公共网站获得相关信息

3.2 描述性统计

从表 3 可以看出,全样本中,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均值为 50.51,其中最高值为 88.94,最低值仅为 36.22,说明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差异较大。在 4 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得分中,只有完整性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均值(70.95%)和易得性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均值(65.83%)得分超过总分的 60%。可靠性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均值(28.45%)、及时性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均值(37.65%)得分均很低,其原

^① 因表格篇幅原因,未详细描述具体的评分标准。

因可能是目前我国公益基金会中披露年度财务预算的基金会较少,且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严重滞后。通过子样本数据对比显示:在捐赠者压力方面,公募基金会 Donator 均值为 0.81,高于非公募基金会 Donator 均值 0.69,说明公募基金会对于捐赠者的依赖程度较大,来自捐赠者的压力较大。在政府压力方面,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政府资助压力均值分别为 0.06 和 0.01,说明政府补助收入比重较小;其次,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政府监管压力均值分别为 0.32 和 0.64,说明公募基金会的政府监管压力相对较大;公募基金会的媒体压力均值为 4.47,高于非公募基金会媒体压力均值 3.65,说明我国媒体对公募基金会关注较多。从成立年限来看,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均值分别为 15.17 和 8.32,说明非公募基金会起步相对较晚,总体处于发展初期。此外,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均值仅为 0.07,说明 93% 的公募基金会由民政部及其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监管;而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均值为 0.39,即 39% 的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均为民政部。

表 3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N=288)			公募(N=174)			非公募(N=114)		
	Min	Max	Mean	Min	Max	Mean	Min	Max	Mean
Total Quality	36.22	88.94	50.51	36.22	79.67	50.71	38.35	88.94	50.22
Integrity Quality	17.81	28.13	21.28	17.81	28.13	21.31	17.81	28.13	21.24
Reliability Quality	3.33	24.81	8.53	3.33	21.91	8.45	3.33	24.81	8.67
Timeliness Quality	2.00	20.00	7.53	2.00	18.00	7.62	2.00	20.00	7.40
Availability Quality	8.00	20.00	13.17	8.00	20.00	13.33	8.00	20.00	12.91
Donator	-0.20	1.00	0.76	0.00	1.00	0.81	-0.21	1.00	0.69
Government Funding	0.00	0.99	0.04	0.00	0.99	0.06	0.00	0.20	0.01
Government Control	0.00	1.00	0.45	0.00	1.00	0.32	0.00	1.00	0.64
Volunteer	0.00	1.00	0.72	0.00	1.00	0.71	0.00	1.00	0.74
Beneficiary	11.78	20.86	16.45	11.78	20.86	16.73	12.38	20.17	16.03
Media	0.00	10.65	4.14	0.00	10.65	4.47	0.00	7.06	3.65
Asset	13.75	21.60	17.91	13.75	20.89	17.90	14.50	21.60	17.93
Industry	0.00	1.00	0.51	0.00	1.00	0.40	0.00	1.00	0.68
Age	1.00	31.00	12.46	1.00	30.00	15.17	1.00	31.00	8.32
Administration	0.00	1.00	0.20	0.00	1.00	0.07	0.00	1.00	0.39

3.3 变量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

通过变量的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表 4)发现,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Total Quality 与志愿者压力、受益者压力、媒体压力、资产规模、基金会行业均显著正相关。此外,全样本和非公募子样本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还与捐赠者压力、业务主管单位显著正相关;公募子样本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与政府资助压力显著正相关,与政府监管压力显著负相关;非公募子样本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与政府资助压力显著负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受益者压力变量 Beneficiary 和基金会规模变量 Asset 高度相关(系数为 0.742,表略),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后面的研究中将删除 Asset 变量。除此以外,其余变量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但相关系数较小,不会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变量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

Spearman 相关系数	全样本(N=288)	公募(N=174)	非公募(N=114)
	Total Quality	Total Quality	Total Quality
Donator	0.119 *	0.034	0.198 *
Government Funding	0.100	0.183 *	-0.253 **
Government Control	-0.085	-0.191 *	0.094
Volunteer	0.231 **	0.178 *	0.314 **
Beneficiary	0.578 **	0.617 **	0.539 **
Media	0.413 **	0.362 **	0.490 **
Asset	0.473 **	0.517 **	0.436 **
Industry	0.221 **	0.275 **	0.189 *
Age	-0.098	-0.091	-0.123
Administration	0.172 **	-0.018	0.390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1%、5% 水平(双尾)上显著相关。

3.4 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 5 可见,模型中 Adjusted R2 值均大于 3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显示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2,说明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Beneficiary 与 Total Quality 显著正相关,说明公益基金会所承担的受益者压力越大,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与此同时,Government Control 与 Total Quality 虽然负相关,但并不显著。此外,Government Funding 与公募基金会 Total Quality 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通过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来获取政府资源的动机较小。同时,Volunteer 与公募基金会的 Total Quality 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募基金会对于志愿者的依赖程度较大,志愿者压力能够对公募基金会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在非公募子样本中,Media 与 Total Quality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公募子样本中,Media 与 Total Quality 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相对而言,媒体压力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非公募基金会的筹资压力较大,更加关注媒体报道所引起的舆论反应。Donator 与公募基金会的 Total Quality 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非公募基金会的 Total Quality 正相关,其可能的解释有以下两个。一是公募基金会具有面向公众募捐的资格,能够较容易的获得捐款;二是多数公募基金会的政治关联性较大,能够给与捐赠者部分隐性好处和荣誉。

表 5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全样本(N=288)	公募(N=174)	非公募(N=114)
(Constant)	2.9(0.608)	-6.6(-1.185)	23.465*** (2.708)
Donator	-2.079(-1.434)	-3.456*(-1.686)	0.601(0.266)
Government Funding	-11.495*** (-3.5)	-13.894*** (-4.122)	-33.443(-1.315)
Government Control	-0.234(-0.245)	-1.025(-0.94)	-2.17(-1.1)
Volunteer	1.46(1.467)	2.312** (2.082)	0.052(0.025)
Beneficiary	2.589*** (7.983)	3.335*** (9.064)	1.075* (1.782)
Media	0.899*** (3.123)	0.393(1.179)	1.445*** (2.74)
Industry	2.059** (2.24)	3.189*** (2.909)	2.469(1.4)
Age	0.051(0.887)	0.065(1.033)	0.084(0.627)
Administration	3.281** (2.566)	-3.26(-1.626)	7.683*** (3.637)
Adjusted R2	0.383	0.487	0.348
VIF	< 1.717	< 1.700	< 1.998
F	20.786	19.246	7.708
Sig	0	0	0

注:(1)***、**、*、.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控制变量中,Industry 与公募基金会的 Total Quality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教育类公募基金会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Administration 与非公募基金会的 Total Quality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的非公募基金会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同时,Age 与 Total Quality 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基金会成立年限长短对其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大。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全国性公益基金会为分析样本,首次从公共压力角度出发,对我国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属性的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差异很大。公募基金会的捐赠者压力和政府资助压力越小,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同时,志愿者和受益者压力大的教育类公募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非公募基金会受益者和媒体压力越大,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且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的高于其他业务主管单位管理的非公募基金会。

以上结论表明,公益基金会所承受的公共压力与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公益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三项政策建议。

4.1 采用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降低披露的时滞性

首先,公益基金会对剩余资产不具有分配权,产权主体缺位,信息不关乎于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这就决定了公益基金会必须接受政府、捐赠者、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其次,相对企业而言,公益基金会有着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Fama and Jensen(1983)认为捐赠者将财富委托给公益基金会,以期获得非物质性的回报,如保护环境、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条件等。因此,就存在公益基金会与捐赠者目标

不一致的委托代理问题^[16]。目前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采用自愿性披露政策,这不仅增加了公益基金会与捐赠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捐赠者的知情权。因此,对公益基金会信息采取强制性披露政策,降低披露的时滞性,对提升公益基金会的公信力有重要意义。

4.2 提倡公益组织开展非商业化审计

根据是否收取相应费用,可将审计分为商业化审计和非商业化审计。目前主流的商业化审计虽然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行业发展,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影响审计质量^[17]。因此,有必要通过非商业化审计做相应补充,完善公益基金会的审计机制,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公益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我国公益基金会非商业化审计早在2008年已有一定发展。在汶川震后重建项目中,深圳明德、中维、中审3家会计师事务所就曾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免费的审计服务。参与具有公益性质的非商业化审计,既有助于会计师事务所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公众影响力,又降低了公益机构的费用支出,从而使更多的慈善资金能够用于公益事业。

4.3 取消“双重管理”体制,逐步扩大民政部门监管权限

现阶段,我国公益基金会由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设立公益基金会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若民间资金无法找到可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则不能成立公益基金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很多业务主管单位就是基金会的发起单位,基金会与业务主管单位之间联系密切,这使得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职能形同虚设。并且,近年来在北京、上海、云南等地已开始尝试逐步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实施效果良好。且本研究也证实,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管理机关同为民政部的非公募基金会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因此,取消“双重管理”体制,逐步扩大民政部门的监管权限,有利于减少政府过度干预所导致的公益损失,提升管理效益,且有其可行性。

参考文献:

- [1] Shim Jae K, Joel G Siegel.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Nonprofits: The Complete Guide to Maximizing Recourses and Managing Assets[M]. McGraw - Hill, 1997.
- [2] Behn Bruce K, DeVries Delwyn, Lin Jing. Voluntary Disclosure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ED/OL]. <http://ssrn.com/abstract=727363>, 2007.
- [3] 陆建桥. 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问题[J]. 会计研究, 2004(9):16-30.
- [4] 刘亚莉,王新,魏倩. 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后果研究[J]. 会计研究, 2013(1):76-83.
- [5]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6] Brown N, Deegan. C, The Public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 Dual Test of Media Agenda Setting Theory and Legitimacy Theory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98,29(1):21-41.
- [7] Cho C H, Patten D M.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s Tools of Legitimacy: A Research Note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7,32(7/8):639-647.
- [8] Walden W D, Schwartz B 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nd Public Press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7(16):125-154.
- [9] Fan J P H, Wong T J, Zhang T.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D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 - 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2):330-357.
- [10] Brammer S, Pavelin S. Building a good reputation[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4(22):704-713.
- [11] Callen J L, Falk H. Agency and Efficienc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Specific Health Focus” Charitie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3,68(2):48-65.
- [12] Tinkelman 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ccounting Disclosures Upon Donations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6.
- [13] 陈岳堂. 非营利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评价及其治理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07.
- [14] 刘亚莉. 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 [15] 程昔武,纪纲,刘子怡. 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设计[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49-57.
- [16] Fama E F, Jenson M C.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2):301-325.
- [17] 杨世忠,刘赛顶.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暨审计质量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2):42-48.